

蘇州

物類志



贵州文物精华

●主编 贵州省文化厅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2005年贵州出版基金赞助★.....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

物

文

文化的多元性和历史的跨度决定了文物的多样性。文物的定义告诉我们，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古代文明的见证。可见，文物在执行载体功能的同时，具有因源而流，因文化而物的特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还忠实地反映出特定文化的民族性及地域性，客观地反映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从而具备了同母体文化相适应的多元属性。

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判断，贵州是一个尚未被人认知的、拥有丰富文物的省份之一。境内蕴藏着的民族文物，可谓丰富多彩，浩瀚如海。伴随着多元文化带来的对文物的重新审视和评估，文物概念的外延将继续拓展，那种追求文物绝对年代的守旧观念将愈发不合时宜，那种轻视支流文化的观点将会随之淘汰。如此，贵州作为文物大省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确认。

更多是出于军事及政策的考虑，贵州晚至明永乐11年（公元1413年）才建省。自此往前追溯2000余年，贵州是氐羌、百濮、百越、苗瑶和汉民族五大族系融合的地域；隋唐以降，贵州是中央政府实行羁縻政策和推行土司制度的多民族区域；迄今，贵州是18个世居民族共居之地，这些民族相沿历时长则数千年，短亦数百年。古往今来，贵州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多民族居住的构成状态，一方面孕育出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决定着各种文化在历史合力中碰撞，特别是在友好往来的和睦环境中互动，从而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互补的特征。

贵州最引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夜郎文化，其面貌虽然犹为琵琶半遮，但日复一日的出土文物，日深一日的学术研究，致使无人怀疑其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辉煌。尤其是灿烂的夜郎文化，虽然迄今仍未整体浮出水面，但其诱人的光芒却也随着一次次为数不多的发掘而释放出来，每一缕文化信息都令人心动目眩。

无论贵州地域性文物抑或民族文物，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共生互补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文物既是文化互动所导致共性趋同的物化，又反映出

地域性或民族性个性文化的张扬。文物所蕴含的历史积淀、精神基因、情感基因、文化符号，既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至尊法宝，又是我们增强地方自信，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振兴地方所不可或缺的传统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就始终是贵州发展路上的主攻目标。无庸讳言，由于地少人多等诸多原因，贵州历史上就无缘富庶，以致史籍中有“黔省不抵江南一大县”的说法。开发贵州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同贫困交战的历史。前人不甘于贫困，创造出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磨砺出同喀斯特地貌相匹配的如山岩般坚韧的奋斗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要重视传统文化的遗存，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中借鉴历史经验，汲取精神养料，激发进取斗志。从这一意义上说，实现贵州的脱贫，首先是精神文化上的脱贫。面对传统文化遗存这一宝库，只有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变求变，使之成为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试想，倘若我们连传统文化都舍弃了，我们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穷人。

荟萃全省文物的《贵州文物精华》出版问世，目的有二：其一，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动态的，都处在不间断的发展和变异之中。然而，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物，又都是静态的，并以其凝固的形式见证着这一文化的某一特定阶段。保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就是要确保文化的动态发展始终不脱离它本身的运行轨道，排除所有强加于它的外来因素；就是要确保通过文物的静态保护，把这一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过程中的每一种智慧的物化形式保存下来，不使其断层，仰不负疚先人，俯不愧对子孙，站在时代的立场上，无负人类文化的传承延续。其二，本书在注重表现贵州文物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关注文物的相关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互动在文物上的细微反映，期冀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文化空间，彰显贵州的宝贵文化遗产；期冀读者不仅从器物学的立场去观赏它，更要从文化的深层角度去解读它，籍此引发思考，有所心得。我想，这或许是编者的本意所在。

□ RELIC ESSENCE CULTURAL OF GUIZHOU

□ RELIC ESSENCE CULTURAL OF GUIZHOU



史前一商周



夜郎时期



东汉



魏晋南北朝—元



明—清

目录

序

04

概述

08

史前—商周

16

春秋战国—西汉（夜郎时期）

30

东汉

86

魏晋南北朝—元

120

明—清

136

后记

206

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文物是悠久历史的重要见证，是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资源，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呼唤和激励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本书首次荟萃贵州全省文物精华于一体，这些文物忠实纪录历史所具有的巨大的时空延伸，展示出一部物化了的贵州文明史。尽管，这里荟萃文物所构成的贵州文化链接，尚有许多断环和缺失，但却足以显示贵州地域文明的特色，成为特定时段文明的标识。透过一件件文物，我们不难窥视到先民们开发贵州的艰难，感悟到先民们闪烁的智慧光芒，领略到先民们富于创造性的成果，体验到先民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精神，并对其表示出极大的敬仰。

贵州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能为贵州摘掉长期套牢在头上的“鬼方”帽子，能为后人撩开贵州文化面纱的神秘之手，正是这些古人类所创制的各类石器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具。目前，省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50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属于晚期直立人的黔西观音洞、桐梓岩灰洞，属于早期智人的水城硝灰洞、盘县大洞，属于晚期智人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威宁王家院子。黔西观音洞由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主持发掘，一掘惊人，掘出了贵州的第一件石器，掘出了历史往前延伸二十多万年的史前文化剖面，掘出了因加工细致及方法多样而被誉为“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类型。由水城人开创的“锐棱砸击法”是南方石器打制技术创新的一个重大标识，在这种技术流传的黔、粤、桂、川、藏、台及东南亚地区发现最早。兴义猫猫洞沿袭这一技术，把“锐棱砸击法”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类型。盘县大洞遗址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拥有巨大的遗址规模，在国内外都十分罕见。普定穿洞是贵州史前文化又一个令人瞩目的闪光点，这里首次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出土的千余件骨器式样多、数量大，在国内外堪属翘楚。其他尚有如马鞍山文化、草海文化类型都各具特征，引人注目。古人类在贵州高原上生存、繁衍、开拓、进取、发明、创造，放射出生命之光，共构了贵州史前文化的灿烂辉煌。每一件具



有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所蕴涵的特质，正是贵州历史个性的证物。

人类如何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这是国际考古学家关注的重大课题。如此丰富的旧石器遗存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贵州新石器遗存的厚望。虽然，发掘日志上总是记录着失望，但征集而来的磨制石器却以艳丽的色彩，晶莹润泽的光芒，给人们编织出一道道谜面。一旦解开谜面，说不定便会把握住隐藏其间的解惑密码。可喜的是，考古工作者们仍在责任感的驱使下跋涉，发掘仍在充满信心的旋律中进行。虽然，考古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不中止的脚步必定会步步逼近必然。新石器遗存的寻觅工作会否如词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同新石器遗存一样，夜郎文化又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夜郎古国是战国秦汉时期确实存在了有两三百年的辉煌文明。由于史籍记载的稀少和模糊，造成了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广泛的神秘感。夜郎古国在史家笔下所遭受的冷落，激起后人探究真相的兴趣，夜郎兴于何时亡于何地，成了后世孜孜求解的历史之秘。有清以来，猜测越发多样，解答越发歧出。进入当代，专家学者们捧着不多的几条史载，里看外看，前看后看，旁征博引，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然而，专家学者们殚精竭虑的论证很难彼此沟通，更难形成共识定论。以至于贵州省博物馆于1996年举办夜郎文化专项展览，只能以“夜郎寻迹”为名，从而避开各执一词的学术之争。

夜郎古国注定不会再现，夜郎真相故事的讲述者只能由文物来担当。随着贵州考古事业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清镇出土而随后又多次在其他地方露面的“一字格曲刃”铜剑，因其形制特殊，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个性，被考古学家所重视。这也是我们迄今见到的第一件或许含有夜郎文化元素的文物。普安青山铜鼓山出土的铜钺，钺身上铸有“”符号，该符号几乎都出土于黔西南地区，推测可能会是夜郎古国某支部族的标志性符号。夜郎时期的青铜兵器除剑、钺之外，尚有戈、矛、刀、镞等，它们讲述的无疑是“夜郎可得精兵十万”的故事。同地出土的铜锄则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夜郎为“耕田”民族的记述，无声演绎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社会画面。另一种可能是夜郎古国部族支系标志的文物出土在赫章可乐，这种小铜铃上铸造着统一的纹饰，在众多式样的铜铃家族中，犹如足球场上统一身份的队服。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赫



章可乐遗址，成百件夜郎时期文物沉睡两千年后，亲吻新世纪的阳光。更令人振奋的是，一种最具神秘感的古代丧葬习俗——“套头葬”破土而出。专家们对此解读出这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当时，该地已出现等级差别，部族中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死后，享有用铜釜、铜鼓或铁釜套头安埋的待遇。如果把全部出土铜釜、铜鼓排列一起，那么，立虎辫索纹耳大铜釜因其大体量不啻犹如鹤立鸡群。该件形体硕大，工艺精良，口沿两侧的立虎仪态威猛，俨然要彰显其主人相对高度的权威性和人所不能的神秘性。依据同期出土的虎造型中有带项圈与不带两种，此立虎脖上的项饰疑为对神虎之渲染。倘若立虎铜釜在标明身份之外，又具有墓主同某种祭祀活动有关的暗示，这就为史载作出了注解，以具象文物揭示出夜郎“俗好巫鬼禁忌”的社会宗教生活。应该说每一件夜郎时期的文物，都支撑着夜郎青铜文化的文明，都指引人们走近夜郎古国历史的真实，也为后人去寻找那昙花一现而失落的文明提供向导。

夜郎古国虽已消失，但它曾创造的文化却已渗透进历史坚硬的岩层，影响后世，成为贵州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不可或缺的基因及源流。

贵州同外界的文化交流，商周时期已有见证，毕节青场瓦窑遗址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及铜镞石范对这一事实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夜郎时期前后，贵州同中原文化以及巴、楚、滇等文化的交流渐多，境内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原地区文化特征的文物，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蟠螭纹铜甬钟、方形玉玦、单耳乳钉纹陶罐，西汉时期的朱绘夔纹海潮图漆盘、提梁铜壶、龟座踞人铜灯，东汉时期的刻划龙凤纹长颈铜瓶、“永元十六年”陶罐、陶镇墓兽等。

这一时期的文物或以造型生动取胜，或以工艺精良称奇，成为贵州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兴仁万屯汉墓出土的铜车马，铜马高大矫健，昂首踏步，动感十足，造型准确合理而又真实自然令人叹服。车马构件二百以上，采用浇铸、锻打、延压、扣合、焊接、铆接等多种工艺，加工技术可谓高超。兴义交乐出土的铜连枝灯描绘了一幅人神共存的场面。该灯双龙盘底为座，龙头仰动，活现活龙；底中部为龟，龟背负人；人物高鼻深目，神态安详；头顶灯柱，柱生枝杈，吹箫者、吟唱者、合十者、沉思者栖枝而踞，各具姿态。该灯体量硕大，造型复杂，人物众多，当属国内精品。

古代的社会生活画面借助文物得以展开，使历史的时空距

离得以接近，凝固在文物上的古代意识得以释放，为历史工作者解读古代提供了直观依据。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水塘稻田模型，陶质圆盘被正中一道堤分隔为二，堤内为水塘，塘内荷莲簇簇，鱼儿游曳，堤正中设闸，控制灌溉放水，闸门之上独出心裁地设制了一个鸟形提手；堤外为稻田，以埂分割成块，田内水稻成行，一派丰收预兆；陶盘内沿壁上浅绘林木，郁郁葱葱，仿佛夹溪而立的山峦。这一模型具有显著的山地特征，表达了古人对山谷环境的规划设想。水塘稻田模型不仅是当时稻作技术与水利设施技术的生动写照，更是古人关于生态意识的反映。模型中古人对水利的重视，对山林的认识，对山谷环境的规划，多少同现代人有些不谋而合。兴仁出土的汉代陶俑佳品甚多，这些陶俑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贵州的底层人物的职业及生活状态。从衣着上看，抚琴俑大抵是一位官府乐师，但见他面带微笑，神色谦恭，席地跪坐，抚弄琴箏。该俑人物结构比例准确、动态自然传神。庖厨俑立于俎前，剖杀鲜鱼，令今人得窥当时饮食文化之一斑。更重要的文化链接沟通在于，它通过对古人起居饮食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解除了后人因历史悠远而形成的对古人的神秘感，使得这些形象更加鲜活起来。喊俑是贵州出土陶俑中最为生动传神的一尊，但见他两手护头，扯大嗓门，喊出悠悠长长极具穿透力的一声。同其他陶俑比较，喊俑具有显著的平民特征，其造型夸张，生动传神，动感十足，极具个性，在我国陶俑中独此一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喊俑虽有残损，仍不失为文物中的上乘之品。“武阳传舍”铭铁炉是一件重要的证史文物，当时主要是为接待过往的驿传人员而制。该炉可烧柴薪煤炭，托盘可盛灰，由于炉身和托盘连铸一体，搬动亦为方便。炉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铭文，“武阳”为西汉犍为郡所属位处交通线上的地名，“传舍”即驿站，“比二”大抵为编号。这件铁炉是古代贵州同中原交通联络的见证物。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同中原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来单照收，一方面演绎出个性的张扬。昭明铜镜背铭文曰：“内清质以昭明，光辉映日月，心忽扬而忠，愁雍塞而不泄。”这是汉代常有的式样，显然是从中原随身携来之物。威宁中水墓葬出土的牛头形铜带钩、飞鸟形铜带钩以中原常见的形式却又十分罕见的造型，见证了文化交流中地域文化个性的张扬。这些带钩并没有采取循例仿照或直接拿来的态度，而是依据地域环境所提供的特色素材进行造型，创造出符合当地生活情趣及审美需要的形象来。牛头带钩的造型以夸张的艺术手法渲染



牛角，而对头部一笔略过，表现关系处理得当，在同期文物中具有一定的艺术典范性。

文化交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费孝通语）的互动过程。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贵州文化既有突破大山的远播，又有绵延后世的积淀。前者例如沈从文先生认为中原地区佩戴的耳环可能最早是由南方民族地区传入。后者则表现为这一时期大量出土的铜条脱、铜臂甲，这些原意为征战时保护手臂所形成的特殊装饰，迄今仍保留在苗、侗民族的服饰习俗中，成为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

魏晋以后，贵州各民族进入频繁的迁徙和融合时期，随着唐宋中央政权相继对贵州采取羁縻政策，贵州同中原地区的联系较前有所加强，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反映在文物上，这一时期的历史积淀颇为丰富，侧重反映为同中原文化的交流和接纳。迄今，我省已发掘清理魏晋南北朝墓葬40余座，出土了一批造型美观、制作精致的珍贵文物，其中平坝马场出土的青瓷莲花罐、玛瑙琥珀项饰两件，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期文物相比，亦不失为精品之作。项饰中的六枚兽形琥珀雕均形神兼备，尤其以琥珀狮雕更是巧夺天工。这些文物多不产自本地，系通过不同的途径从外地交换而来，它们为研究贵州文献资料十分匮乏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提供了实证。

唐宋时期，贵州并非中央政权经营西南的重点。朝廷以招抚封官为诱，吸引境内民族首领纷纷率土内附，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这一期间常有贵州各地民族首领前往朝廷进贡，其中有两次朝贡因其所产生出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而成为历史的闪光点。一次发生在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东谢首领谢元深率各支首领进京朝贡。“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帽，以垂络额，毛帔，以韦为行，着履”（《图画见闻志》）。奇服所展示出的异俗文化引起朝廷重视，中书侍郎颜师古得到皇帝许可，绘《王会图》。由此以图绘形式记录民族服饰文化的做法再度兴起并历代相传。沿及宋代，出现专门的苗瑶为图的刻本《黔南职贡图》（《宋史·艺文志》）。进入清代以后，朝野皆沿用此法。朝廷绘本称《皇清职贡图》，民间绘本则因绘制对象及地点不同而各有其名，以贵州一带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统称《百苗图》。如此看来，谢元深朝贡对历史的贡献远不能用旋及消失的政治交易去衡量。另一次发生在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地方首领“龙汉绕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群牂诸蛮来贡方物”，“其使十数辈，从者千余人”（《宋史》）。一行人为朝廷带去了具有贵州特质的文化表演，表

演中既有瓢笙吹奏出美妙的“水曲”，又有随之而起的连袂婉转的笙舞，还有以足顿地发出的明快节拍，致使京都领略了来自贵州高原的民族文化，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两次朝贡皆未有遗物留存，却给我们的遐想留下了足够的文物空间，赋予我们审视历史文明时不可或缺的应有视野。

宋代为贵州留下最实实在在的物质遗存当属杨粲墓。杨氏一族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入黔，遂子孙世袭播州，至明万历29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自刎海龙屯，传袭28世，执掌播州达725年。杨粲系杨氏12世，袭播州沿边安抚使，掌政40余年，官拜武翼大夫，封威毅侯。杨粲墓不仅在省境内的众多宋墓中首屈一指，就是在西南地区已发现的宋墓中也是最大的一座。该墓为石砌仿木结构双室合葬墓，墓室占地面积50平方米，用496块砂岩条石砌成。因曾被盗掘，出土随葬品不多，有铜鼓、铜镜、彩绘陶瓶、影青瓷碗、“崇宁通宝”、“崇宁重宝”等。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墓室内190块精美的浮雕石刻。浮雕石刻有“墓主人像”、“持扇侍女图”、“捧壶侍女图”、“童女石门”、“捧巾女官图”、“捧奁女官图”、“敬贡人”、“武士”、“宝瓶”、“野鹿衔芝”、“虎柱”等。这些石刻不仅形象生动，雕刻精美，而且人物众多，内容广泛，为我们展示出十分具象而直观的宋代土司庄园生活。杨粲墓出土的铜鼓、金凤冠皆为价值不菲之文物。铜鼓命名“遵义型”，同我省麻江谷硐出土的“麻江型”铜鼓，都被作为我国古代铜鼓八大类型的标准器。杨粲墓亦因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贵州自秦汉至明清，既是封建中央王朝开疆拓土，巩固大一统国家必须开发经营之地，同时又是常因战争动乱，朝廷势力衰微而鞭长莫及之地。元代以土司制度替代唐宋的羁縻政策，两者一脉相承。土司制度沿及清代“改土归流”之时，在贵州推行了约350年。选入本画册的几方土司印正是这一漫长历史的见证。中央政权推行土司制度对统治管理边疆民族地区固然有其进步作用，但小小的一方土司印作为权力象征，也必然成为了阻碍交流和开发的屏障，这就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积极开拓疆域的同时又无可奈何的苟且态度。

贵州自明永乐11年（公元1413年）建省后，中原文化在这里的交融渐趋巅峰。清代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交流碰撞，虽然裹挟着血火硝烟，但却实实在在拉近了贵州同内地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主流的距离。这一时期的文物明显多于前朝。遵义团溪杨辉墓出土的彩釉陶俑群堪为这一时期的文物精品。陶俑共70件，通高21.5~28.5厘



米，计有骑马俑33件，含佩剑武士俑6件，捧印俑1件，吹号俑4件，持物俑14件，负物俑8件。其中步俑37件，牵马俑1件，持物俑14件，乐鼓俑9件，侍步俑13件。这是迄今贵州出土阵容最大、人物最多、形象最丰富的俑群。这组文物大抵表达墓主人生前威风，死后仍思不失显赫，在队伍簇拥下通向另一世界的愿望。但它更像一幅社会风俗画，让我们看到了明代流行黔北地区的服饰、兵器、乐器，具有山地特征的礼俗文化。同时，它也使我们的领略了当时黔北陶塑工匠的精湛技艺。

教化渐开的贵州此时期出现了不少文人墨客，他们的墨宝佳作有的幸存至今。他们的名字成为贵州人追溯历史时涌动于胸的一份自豪。他们是：官拜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陈夔龙、以书写颐和园榜额而遐迹闻名的严寅亮、才思机敏的清代名进士周起渭、清代贵州名画家周之冕、曾任安顺知府卸任后客居贵阳的孙清彦、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李端棻，号称“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和近代著名外交家黎庶昌。他们的书法或笔力雄浑，技艺超群，或独创一格，蜚声当时；他们的绘画或山色空濛，意境幽远，或花鸟鱼虫，尽活笔底。

在收入画册的书画作品中，有两件很重要又极有意义的文物，它们是两位清代名画家留给贵州厚重的文化遗产。第一位是清初名画家黄向坚，他入滇寻亲途径贵州，沿途以实景为题，画下了盘江、凯楼坡、龙泉县、相见坡等幅。《盘江图轴》画面山峰耸峙，江流湍急，河礁林立，一桥飞度，江岸村舍，隐约白雾之中。黄氏笔下的盘江即北盘江，当时晴隆境内的盘江索桥是历史上省内最大的索桥，是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盘江桥的雄伟身姿及制作之精妙曾引发徐霞客的议论，继而又激活黄氏之画笔。另一位画家邹一桂，所作《楚黔山水册》，指名道姓图写湘黔两地景色，全册二十二幅中十七幅是描绘贵州风光的，表现了白水河、相见坡、天柱县、铁索桥、黔灵山、玉屏山、涵碧潭、飞云岩、东山、照壁山、葛镜桥等处风景。像这样出自古代名家之手，又是以黔中山水为创作主体的画册，在传世绘画中是至为罕见的。这些画幅以实景山水为题材，以地域特征为侧重，不仅让我们见到了贵州数百年前历史状态下的生态环境，也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业已失却的建筑形式及已消失的村寨。而且，作者们还吟诗撰文，题款记录风情或抒发自己对描绘景点的感受。可见，这些画幅已远远不单纯是艺术品，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历史价值，成为了解贵州古代地理及

民情风貌的重要实物依据。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境内有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是贵州文化资源的天然优势。贵州省民族文物的蕴藏十分丰富，随着传统的文物概念在多元文化理念冲击下的拓展，绝对年限的文物标准的被摒弃，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加强，贵州跻身于民族文物大省将为期不远。本画册因以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物为限，而民族文物由于多木质、布质的特性存世百年者不多，故入选较少，但凝结其内的智慧结晶，不啻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之瑰宝。现存于世最早民族文物当属平坝棺材洞出土的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衣裙上的纹样繁复而精美。据考证，当属宋时“点蜡幔”之作品。因大山封闭，贵州民族文化周期相对滞缓，致使某些文化事象保留有较多的原生态特征，被喻为“活化石”。蜡染至今在贵州苗、布依、侗、瑶、水等民族中仍十分流行。宋代蜡染衣裙同现代苗族蜡染似有渊源关系，纹样虽有差异，却貌离神合。民族银饰作为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相对要短，大抵为明以后传入，经过审美、取舍、整合的民族化过程，形成今天既有中原文化积淀又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饰物。流行于黔东南地区保留着早期形态特征的傩面具也是按照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及定型的。

“礼失求诸野”。由于文化发展的互动性，许多在原生体已消失殆尽的文化元素，却出乎意料地被另一支文化体所吸纳保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绝不局限于本民族，它往往会突破文化上的民族疆域和民族心理壁垒，在更广泛的空间得到认同。当然，这一切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研究和认识。贵州少数民族多无文字，民族文物因而成为这种无字文明的载体，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可以涉及民族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领域。换言之，民族文物是深层次解读民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的，无论是无声讲述历史的出土文物，还是标志一代艺术峰巅的名家书画，抑或是潜藏着委婉曲折故事的器物，也无论是表现贵州各族先民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复杂矛盾统一中熔铸自身文明标识的具体物证，都折射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交相辉映，彼此吸纳包容砥砺的特质。我们将贵州历史中的粗犷与精致、神秘与悠远荟萃一书，期望给人以绵延久长的回味与浮想。